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 :重返 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社会
2019 · 1
CJS
第 39 卷

田 耕

摘 要: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 19 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

关键词:社会学民族志 田野工作 情感结构 直接观察 进步主义道德

DOI:10.15992/j.cnki.31-1123/c.2019.01.003

The Power of the Sociological Ethnography: Revisiting Some Fieldwork of Early Social Research

TIAN Geng

Abstract: Since about the 1970s, sociological ethnographers have incorporated much of the traditional humanistic approaches into their fieldworks and narrative writings, and in so doing, have expanded the boundary of ethnography. This development, however, has not dissolved the tension facing

* 作者:田 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Author:TIAN G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E-mail:gengtian@pku.edu.cn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 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学实践的演变机制研究”(16BSH004)的阶段成果。[This research is funded by the projec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Study Practice in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16BSH004).]

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浙航同学的协助。文责自负。

sociological ethnographers between depicting the intensely first-hand experiences and theorizing them simultaneously. This paper proposes a historical as well as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is recurring tens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 social researchers of some very important fieldwork conducted betwee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the end of the WWI conflated moral visions into their ethnographical inquiries. These early researchers sought out direct observations of the social world but, each in his own ways, managed to epitomize their subject matters 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fered a new structure of sentiment that added experiential valor to the normative sensibility characteristic of their times. The moral dimension of the early fieldwork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gressive morality. It is therefore argued that a serious exploration of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 empirical study,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and the moral reformation is crucial for the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xisting knowledge about the growth of sociological ethnography as well as the progressive morality itself.

Keywords: sociological ethnography, fieldwork, structure of feeling, direct observation, Progressive morality

一、社会学民族志的内在张力

什么是社会学的民族志(sociological ethnography)?这个问题显然要通过理解什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来解答。今天,社会学的民族志实践已超过百年,研究者系统编写社会学民族志的导引性著作也至少有半个世纪的时间,至于中国社会学和社区民族志的密切关系更是学界的通识。我们当然知道,社会学的田野工作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通过足够充分的在场观察,对图像、文本、实物(包括仪式场景)材料的观察和搜集,以及不可或缺的深度访谈(例如生命史访谈)来理解研究对象对行动和生活过程所赋予的意义(Goffman, 1989; Hughes, 2002; Vaughn, 2009: 690)。社会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经历了若干重要的阶段,我们对其熟知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二战后研究者努力的结果。例如,“符号互动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布鲁默提出的激活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Blumer, 1954),以及源自二战后芝加哥学派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Glaser and Strauss, 1967; Strauss and Corbin, 1994),都和今天我们认识的社会学民族志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在“扎根

理论”提出之后的 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当调查研究大规模走入研究型大学并主导成立了一系列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后，社会学民族志再度兴起 (Converse, 1987: 239—244; Goldthorpe, 2000: 65)。

如果按照这样的界定，我们会发现，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民族志的范围已经经历过重要的扩展。一方面，今天参与田野工作的不仅有历来和民族志写作区别很大的调查性研究 (survey studies)，也有传统上极为重视档案和语文传统的人文科学。¹ 田野部分的研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自然和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普遍重视重建社会行动与过程的生身处境大有关系。² 那么，在这种对社会变迁与行动者的生身处境的普遍关注之外，社会学田野工作的特别之处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社会学的民族志当然和以变量为基础 (variable based) 的社会研究有明显区别，然而，即使不同意以变量为主导而提倡回到社会生命中具体的林林总总 (cogs and wheels)，社会学与人文科学仍然有民族志之外的若干选择。在摆脱变量思维之外，社会学的民族志并不见得是最能理解和叙述行动者的意义世界的选择。上述两种直接的质疑，前者涉及社会学民族志如何看待田野工作中的对象所具有的个性的问题，后者涉及民族志的文本如何叙述田野工作的对象的问题 (Van Maanen, 1988; Abbott, 2007)。

在田野工作得到普遍认可乃至空前强化的前提下，社会学田野工作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这一点仍要从社会学如何认识其田野对象的个性的特点来看。在田野工作中，民族志的研究者常常面临直觉到但无法断定的个性。田野工作者能够体察这种存在方式的重点在于能够叙述这些主体如何开展行动 (Abbott, 2001)。恢复，在很多时候意味着田野工作的首要冲动是恢复其对象的生活时间、聚落、行动的轨迹，以及在面临选择时所具有的计算、踌躇和心无二念。有的时候，还要去尝

1.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历史学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田野对 19 世纪农民战争的再研究，具体可参见马长寿 (2009) 的相关研究，另见温春来、黄国信 (2017) 主编的历史田野调查教材。

2. 这个工作分为典型的两类，一类是遭遇 (encounter)，这是田野工作最常见的形式，也就是研究者身为外人，不仅需要熟悉被研究的当地人，甚至还会要求暂时忘记自己的身份。另一种是研究者已经身在其中，或者至少曾经参与生活的观察，中国学者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在“家乡田野”中写成民族志《江村经济》的费孝通与《义序宗族研究》的林耀华。这可以说是双重意义上的“参与观察”，因为有相当的努力花在了“化熟为生” (go alien) 上 (Desmond, 2007: 284—294)。

试一项更为困难的事情,那就是恢复这些对象自己对上述种种情形的叙说。也就是说,写作社会学的民族志需要把研究对象从某种总体中的一份子变成一个具备生长情境的主体。并且,田野工作者需要把和自己发生具体关系(实在或虚拟)的主体放到叙述者的位置上(Abbott, 2001:14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总体一分子的“个案”相互的边界是清晰的,它们可能面目模糊并且没有个性,但相互之间不能替代。民族志作者则很少能预设自己研究的对象和别的个体之间具有这样的边界,田野工作恰恰是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边界不清晰的状态下进行的。对民族志恢复个性的工作来说,这种不清晰反倒可能是重要的灵感来源。

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社会学民族志对研究对象个性的了解不仅和代表性抽样(representative sampling)有明显的区别,³其对田野对象的生身处境的关注也不完全是一个在地情景(local context)的复原或地方性知识的呈现。田野工作掌握个性最重要的入手点之一就是类型化(typification),而类型化工作的前提之一则是恰当和确切地区分(田野对象)实践意义上的“典型性”和民族志分析工作的典型性。⁴对这二者的区分固然使得社会学的民族志观察对主客位、田野的内与外等区分异常敏感,但这种敏感不是为了保存一个不被民族志所挪移的本地经验,而是在种种的外来力量和事件中看到“自然的社会过程”。⁵那么,社会学民族志用什么样的经验描述来完成类型化的工作?这样的类型化又怎样体现田野对象的个性,特别是怎样体现“自然的社会化

3. 渠敬东(2019)的文章即以典型性和代表性之间的区分作为理解个案的开始,社会学民族志方法意识中的个案(无论是比较还是单个案)在关键事实上深入带来的是类型化,而不是抽样框带来的代表性,这一点仍然是今天社会学民族志严格遵守的知识学基础(Pacewicz, 2016:309)。“完全性”(exhaustiveness)的观念在20世纪前期走向代表性抽样的关键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概率论、微积分与抽样理论的结合(Desrosières,1998:221-226)。

4. 渠敬东(2019)“项目制”进村的例子表明,正因为有两种典型性的存在,“最典型的个案不典型”和“最典型的个案最典型”两种表面上相悖的逻辑才会共同存在于项目制中。项目动员当然会干扰项目对象(实践意义上的),但典型个案,无论是理想个案还是极不理想个案,都被选入项目,比起个案特点,这反倒更为典型地反映了项目制本身的制度进程(理论或分析意义上的)。关于实践和分析意义上的概念区分可参见布拉贝克和库珀(Brubaker and Cooper, 2000:4-6)以身份(identity)为例的解说。

5. 渠敬东(2019)把“无事件境”这个充满叙事理论气息的说法变为“再日常化”,将之作为“自然的社会过程”的核心。这个说法一方面强调社会生活为什么“不中断”的力量如此强,另一方面又关注为什么“再日常化”造成了个案研究的理论化雏形,后者包含的问题更为关键。

过程”的呢？这是我们对于社会学民族志要问的第一组基本问题。

田野工作具备多学科的研究形态之后的另一个趋势是对叙事的强调和探索。“叙述”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被认为是传统史学或典型人文学论述的形式。在社会科学式地讲述故事和人文式地讲述故事之间，理论意识和量化技术的使用被认为是造成差别的关键之一（Sewell, 1992）。但 70 年代之后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反思如何讲故事的结果之一就是叙述的复兴（Stone, 1985）。今天，人文学者与社科学者的一致关注是叙述如何成为他们研究对象看待、理解和想象自己的手段，而不是一种人文讲述的手段。“社会叙事”（social narrative）实际上是将讲故事作为自我认同生成的途径。叙事理论进入社会科学使得人生史在《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s*）之后再度得到社会学的关注（Steinmetz, 1992）。口述史的加入复杂化了对叙述结构的探寻，对如何使用诸如自传、日记等人生史材料也在 70 年代之后呈现了和上一代学者的显著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40 年前的“叙述转向”和它们反对的机械的结构分析可能坚持的是同一种叙述方式（Abbott, 2007）。在深具解释性的“讲故事”里面，我们不得不将抽象的概念以及他们之间的动力学（关联和因果机制）与对活生生关系的具体描述混合在一起。不过，这种混合绝不意味着一种社会学民族志的写作习惯而已（无论认为其是好还是坏）。在这种混合叙述的背后，我们对个案的想象力被给这些个案一个道德上的看法很强烈地束缚。换句话说，对个体的叙述恰恰意味着找出这样的个体如何具备一种我们不知道的生活深度。⁶这种深度触发的并不是道德（规范性）的意识，而是情感结构，或者就是一种兴奋。⁷只是这样的情感结构是不是能进一步触及我们在社会学话语和概念中暂时也捕捉不到的规范的力量？它是不是能让我们对那些被认为明确表达了规范性的概念和说法产生新的反思呢？这是我们对于社会学民族志要问的第二组基本问题。

6. 渠敬东(2019)以传记法在人生史上的使用为例讨论了这一点，艾伯特(Abbott, 2017)用涂尔干的书信讨论了理论家和自身理论的关系如何构成了这种道德情感。

7. 艾伯特(Abbott, 2007: 72-82)对“游吟”(lyrical)和“叙述”的区别试图证明，前者最独特的地方在激发对社会事实的情感。

上述两组基本问题的背后是社会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中情境特点与理论特性并存的张力(Walton, 1992; 项飏, 2012: 46)。一方面, 我们很可能进入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思路, 因为个案是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中实在的发生, 个案在经验中的整体性完全取决于它的具体发生(occurrence)。另一方面, 我们也很难拒绝“唯名论”(nominalism), 因为我们最终呈现的个性就是理念类型上的个体性。我们在理论想象和构造的工作中, 并不会看到那些将经验要素(时空、行动、过程等)融合为独一无二的“发生”的整全性, 但它在观念上的复杂却奠定了个体之间“类存在”的概念基础。⁸ 社会学的田野工作者总是希望把这些情境性, 或者说观察到的发生, 和理论想象力结合起来。这种双重性所触动的也只是进行田野工作的研究者, 而不是在具体生活的时空中把这些个案变成生活的那些人。⁹

围绕上述争议, 社会学的民族志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历了若干知识学上的辨析和争论, 例如, 民族志的写作在理解、解释和规范性的贡献方面何者为核心(Thatcher, 2006); 民族志是否首先是对民族志写作者的自我反思(Scheper-Hughes, 2001; Hughes, 2002); 民族志写作的非系统性是否会成为虚假的叙述(Duneier, 2011), 等等。同时, 民族志的研究者也进行了许多关键的尝试, 其中之一就是, 民族志如何克服田野的具体时空对其理论想象力的束缚(Burawoy, 1998; Duneier, 2002; Hannerz, 2003; Bearman, 2005), 以及民族志和历史想象之间的联系(Brubaker, *et al.*, 2008; Burawoy, 2009)。但民族志作

8. 威沃卡(Wiewiorka, 1992: 159)恰当地用病人和疾病的比喻指出了个案研究的这种两面性。

9. 对这种紧张, 对科学生活和金融交易市场都做过深入的微观观察的科诺一赛廷娜(Knorr-Cetina, 2014: 30)提出了所谓“直觉性的理论化”(intuitive theorizing)的问题。不过, 作者建议的理解方向是, 直觉的经验是因为被无意识地转化而成为我们理论知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Knorr-Cetina, 2014: 39)。与之相较, 戈夫曼(Goffman, 1974)后期作品对于观察在何种框架下进行, 以及我们对这种框架如何澄清所做的研究, 更像是早期社会学田野中“直接观察”这一强烈但含义不清的说的继续发展, 事实上, 戈夫曼从1961年的《遭遇》(*Encounter*)开始, 就把田野的意义放在了互动中, 在戈夫曼那里, 对“直接性”的重视其实是非常个体化的社会场景, 而互动意味着表演(performance), 也就是生产刻板印象(stereotype)最重要的机制。田野的意义放在互动当中, 意味着个体化的生活和类的生活的遭遇, 极为个体化的生活很难承受, 因为它会消除种种刻板印象。怎么处理表演, 就决定了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个体化与社会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戈夫曼对互动极具创造性的呈现和理论化模式, 将早期社会学研究中的“直接观察”不仅带入极其现代的社会学理论思维, 也带到现代社会本身。

为方法所具有的更大的开放性和它在跨越区域研究传统上的进展似乎并没有缓解其践行者具有的焦虑。社会学民族志用什么经验描述来类型化？又如何搭建一种可能改变我们规范性思考的情感结构？社会学民族志描述类型化的语言如果可能揭示一种我们不知道的生活的深度，这种深度除了注定要改变道德观之外，是不是能改变我们看待我们这些道德观念的情感？上述两组问题之间的关系今天仍时不时在纠缠我们。

本文将不会进一步推敲社会学民族志在知识学上的争论如何改变了田野工作的实践。在后面的部分，我们将采取一种“理论—历史”的方式看待上述两组基本问题。我们仍然不能忽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早期社会研究对社会学民族志的奠基。以一战为大致的分界点，这个奠基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段。¹⁰在前半段（19 世纪末到一战），社会学的田野工作孕育在社会调查运动的兴起和传播中。在后半段（一战后到 20 世纪 40 年代），社会学的田野工作更加集中地体现在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y）和城市民族志的进展里。

由于中国社会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迎来了第一个民族志研究的学术高峰，我们因此对这一奠基时代“后半段”有了更多的关注，也对它的学术脉络有更多的同情（杨清媚，2010；齐钊，2013；田耕，2017）。所以，本文的论述对象将从我们相对陌生和在学术正典中更为边缘的“前半段”开始。在学科史上，对这个相对陌生的社会学传统的认识，我们多少会受到两个议题的重要影响，一个是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的区分及前者向后者的转移，另一个是改良式的研究努力和学科式的研究的区别及前者向后者的转移。前一个议题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就已为中国学者所关注。¹¹因此，重新思考 19 世纪末到一战前的社会学民族志，不仅是因为它和中国早期社会研究的关系，也是因为其经验和道德感受力和此后时代的关键差别。回顾这段历史，或许并不能完全回答上文提出的民族志研究者的问题，但也许可以部分揭示这些问题的由来。

10. 我们从英国社会调查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间接印证这种时段区分的合理性。广义的英国社会调查的第一个高潮是 20 世纪的前十年。在一战之中开始下滑，从 1921 年开始到二战前夕达到高峰（Bulmer, Bales and Sklar, 1991:18）。

11. 例如，杨堃（1991）对李景汉所著的《实地调查方法》的评论，以及学科史上对此两派的评（李章鹏，2008；吕文浩，2008）。

二、“直接观察”田野与进步主义时代的道德观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族志,或者说社区研究作品,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如何进行观察上。这一点在出身为矿业工程师的勒普莱(Pierre Guillaume Frédéric Le Play)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从勒普莱的旅行和深入各个工作场所的观察开始,他就开始在初生的社会科学中倡导一种新的观察社会的办法(methoded' observation)(Porter, 2011)。¹²在海涅写下动人游记的哈茨山(the Hartz Mountain),勒普莱不仅对开矿的方法与流程有直接的观察,也对生活在矿山的工人的家庭进行了直接的观察。因为他对工人的家庭预算(family budget)使用过于有名,这种账簿也成为对个案进行专门研究(monographic method)的方法核心。它不仅给勒普莱在1885年之后带来很大的名声和奖励,还被此后对大工业社会的调查广泛使用。由于勒普莱本人对统计学之于政府行政的重要性有相当的强调,在法国这个传统政治智慧被大革命打断的国家,作为国家技术的统计学也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Porter, 2011: 285)。但在勒普莱的同时代人看来,这种对经验的直接描摹在1870年之后的法国社会情境下显得不仅刻板,也近乎肤浅(转引自Pitt, 1988: 75)。所以,勒普莱的直接观察只留下了一些简化的印象,没有像账簿一样,成为早期社会研究的标准入手点。

勒普莱对观察的强调首先是一种对经验与科学关系的理解。对统计数字的获取和对工人直接观察的迷恋在勒普莱那里同属于直接观察的手段,只有从事制造的人才具备这种直接经验。在勒普莱看来,制造东西的劳动者承担了经验中尚未被科学意识到的种种微妙的劳动,对这些劳动者及他们的生活最直接的体察才是推进科学最重要的动力,对劳动者的直接观察也就变成了最直接的经验呈现(Porter, 2011: 286)。这种劳动经验是19世纪逐渐去人身化的统计学(统计调查)所越来越难以呈现的。而且,在和勒普莱一样经历过严格训练而且亲身前往工业第一线的工程师看来,也很难被实验室

12. 值得注意的是,勒普莱在其职业生涯初期(1840—1851)关注的仍然是法国行政史传统的人口结构,他所倾心的也是注重人口分类的德国统计学传统。他尤其关注行政统计数据的质量(Silver, 1982: 48—50)。

科学所捕捉到(Pitt, 1988:74—75)。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勒普莱在学科史上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东西——田野观察法、调查图表、典型家庭和对父爱传统的执着,等等,回到本文开始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勒普莱提倡的直面田野对象相当早熟地提出了“经验”的理论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最直观的经验写作中“发现”理论,而不是证实或证伪理论假设?

在勒普莱和远途旅行相伴随的“调查”中,他更像是在实现一种早期的“社会学民族志”(Liebersohn, 2003)。在这种旅行志中,勒普莱远离城市,更加接近了一些保存了恩主庇护关系的老社区。¹³只有那些熟悉而且在意自己治下的劳动的恩主和家父,而不是他在法国和英国无畏投入城市调查的同行们,才知道在这些土地上的劳动到底发生了什么。勒普莱和同时代的早期社会研究者有些不同的是,首先,他认为直接观察制造物产或者财富的人(homo fabre)才是经验中最不可欺的部分,其次,要观察这些制造财物的劳动者,就不应该离开使其成为劳动者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劳动者和他们的庇护者没有中断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作为19世纪社会研究者,勒普莱的矛盾之处在于试图用直接的经验观察来重建在西欧,特别是法国,已经面目全非的传统生活。恩主不是作为家父长而存在,而是作为对乡民生活有直觉性的了解的人保存了有机的社会方式(organic social order)。勒普莱之所以倡导田野工作者要对所在社区有着家父长对祖地那样的熟稔,是因为个案的足够深入是类型化的必经之途。这一点在他同时代的民族学(ethology)和心理学,以及类似冯特那样横跨两者的研究者那里都有类似体现(Desrosières, 1998: 216—217)。

有意思的是,勒普莱与他最有名的合作者学生谢松都是在大革命与工业时代不可逆转的时代以研究社会平安(insurance)的体制闻名。在讲台上把勒普莱的社会研究理想继承下来的谢松也自认为继承了老师在田野工作中的道德理想,但合于时代的道德意味着是用“社会”而不是“父爱”来保障团结。这样的团结需要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一种在谢松看来“以数学为基础,以道德为冠”的科学(转引自

13. 勒普莱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俄国和中欧地区的农村社区(Porter, 2011:289)。

Donzelot, 1988: 404)。¹⁴在这样的理想中,勒普莱和在法语世界之外影响更大的比利时人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的研究首要的意义不是建立一个不知变异的平均类型,而是确立在何种意义上这些类型是本身即为道德的社会事实(unwilled collective fact)(Donzelot, 1988: 400)。这种事实具备在种种不可期待,乃至不道德的行动倾向之外的稳定基础。¹⁵无论是涂尔干通过集体表象最终严格区分“集体意识”和风俗的重要努力,还是“普鲁士统计学派”和国家科学对民族联合体的阐发,它们看似方向相反,但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新的“整体论”(和“唯名论”)上继续凯特勒和勒普莱的尝试。他们最真切地面对了人造“道德人”身上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承认个人化的行动倾向

14. 谢松致力于发展的“平安”(insurance)和当时各种降低社会风险的治理结构,例如,年金(pension),都深深表现了工业时代的道德想象力的变化。也就是说,社会组织不仅是确保有用的劳动力,或者有用之人口的基础,其本身也是新的团结的单元(Deleuze, 1979)。这种想象力一方面要突破“机械团结”,另一方面,仍将对抗治理术自18世纪转向以来的重要的遗产,即对社会状况的知识和权力的去道德化之间的相互促进。这样的遗产遭到的第一次重要的反对就是卢梭重申国家的核心是法理基础的《社会契约论》(Foucault, 1991: 104—105)。而这里所说的道德想象力,并不是从国家(主权)权力的“政治—法理”特点出发,而是从18世纪西方人口扩张本身带来的道理情感与原则变化入手,这个变化的代表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和恩格斯(Abrams, 1968: 27)。关于“感受力的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可参见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小说”(industrial novels)的描述(Williams, 1960: 94—118)。在对加斯科尔(Mrs. Gaskell)的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的解读中,威廉斯非常精准地点出了工业小说和这个时期社会研究的共同点。他们都是高明的民族志作者,这个写作越细致,对劳工的恐惧和关切就同在。

15. 社会学史上主要是将“均值人”(l'hommemoyen)式样的道德统计与此后由挪威统计学家凯尔(Anders Nicolai Kiaer)代表的着重变化(variation)的统计发展相对比(Desrosières, 1998: 225—230; Goldthorpe, 2000: 70—75),这一点也被认为是勒普莱致力于典型的田野观察的致命缺陷之一(Bulmer, Bales and Sklar, 1991: 16)。但施蒂格勒(Stigler, 1999: 58)很简练地指出,凯特勒的“均值人”主要的对手是近代早期以来寻求统一因果律的“机械论”世界图像,因为在凯特勒的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中,身为一个人造之物,“均值人”却会随着各种不同的倾向(heterogeneous propensities)而行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寻找一个人的理性之上的模糊的社会(Desrosières, 1998: 78)才会被认为是凯特勒与启蒙思想的前辈(如孔多塞与拉普拉斯)的差别所在。在后者那里,概率指的是多大程度上一个理性人自然相信自己在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而在凯特勒之后,指的是社会的规律(Porter, 1987; Hacking, 1987),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不是因为人是理性的,而是即使人有无以测量的理性,仍然会具备的规律(Daston, 1987: 295)。

和最强烈地要求整体观的道德。¹⁶

在改良主义汹涌的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面对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变迁,城市逐渐成为这些有志于获取大量一手数据的社会研究者的首选之地(Danbom, 1987; Rodgers, 1998: 112—130、181—208; Schweber, 2006)。这首先是因为城市产生了在他们看来对道德生活最严重的冲击:贫困和犯罪(Abrams, 1968: 38; Bulmer, Bales and Sklar, 1991: 7—8)。在以道德统计学(moral statistics)为名义进行的社会调查中,其基本的对象是有碍于普遍道德的特别风俗和习惯,而其最直接的动机是改良,即防止贫困和犯罪等“危险人口”因为沉浸在这种特别的城市生活而无法重返常人的道德。¹⁷更重要的目的是,怎么通过对不正常的风俗的探究和治理,最终形成比风俗更为崇高和持久的道德理想。¹⁸

从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期开始,大西洋两岸的“社会疾苦”(Social Question)不仅意味着用更大范围的劳工问题来涵盖此前关心的贫穷,也意味着在劳资冲突之外找到开启社会团结的新基础(Stone, 1985; Rodgers, 1998: 11)。从“社会疾苦”到“社会团结”,虽然是一反一正,但整体性的社会观念却相当一致。当这样的道德焦虑从改良人士向社会中层蔓延的时候,首先被质疑的自由派并没有放弃个人德性(virtuous individuals)(Collini, *et al.*, 1983: 18—20)的念头,反而成为最先成就各种社会建设(social engineering)的旗手(Danbom, 1987; Lasch-Quinn, 1993; Flanagan, 2007: 9)。在社会学的理论史上,从托克维尔到涂尔干的时段见证了各种自由主义改良工程学的高峰(Drolet, 2003),但也因此否定了此前“社会疾苦”中包含的极其强烈的整体社会的色彩,换言之,就是降低了寻找新的社会概念与“社会的科学”的冲动。¹⁹我们在下

16. 涂尔干这一尝试也是他思想前后分期的关键点之一(陈涛, 2017: 105—107)。关于普鲁士统计学派和国家科学对“联合体”的论述可参见相关文献(Hacking, 1987; Schumpeter, 1994: 210; Lindenfeld, 1997: 132; Wakefield, 2009: 17; 叶启政, 2018: 169—171)。

17. 相比起贫困,犯罪更为直接地和笼罩劳工的“危险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也成为道德统计最直接的来源(Friendly, 2007: 269—270)。

18. 我们在上文提到过,道德统计学最终的成型并不依赖对犯罪和贫困的风俗解释,而依赖在风俗解释之外的道德理想的建立,阿敏斯特罗(Armenteros, 2007)用德迈斯特(de Maistre)反卢梭来论证“正常人性”(normal humanity)在大革命后的建立说明了这一点。

19. 在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否认“社会疾苦”而认为只有“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的判断越来越多(Abrams, 1968: 44; Horne, 2001: 18; Goldman, 2002)。美国社会学家瓦尔德(Lester Ward)将之称为一种“自由派的实证主义”(liberal positivism)(转引自Lacey, 1993: 144)。

一节将进一步叙述的在工业时代的英格兰(伦敦)和美国钢铁区(宾州的匹兹堡)的社会研究,以不同的方式延续和发展了这种社会工程学在田野工作和道德中的想象力(Gusfield,1963;Deleuze,1979;Horne,2001)。

三、经验与规范的田野:进步主义的调查

勒普莱笔下的社会调查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的没有大断裂的社区进行,将被直接观察继而描述的对象视为平均类型。这种“深描”和类型之间的关联到了20世纪中期已经非常淡化,但在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观察中却很关键。²⁰早期社会研究在思想和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对类型(type)的理解。从19世纪中期到二战前的约100年内,无论是勒普莱对田野个案的细致描摹,还是布斯(Charles Booth)在伦敦的贫困调查,抑或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涂尔干领导下的社会学“年鉴学派”的田野实践,都在各自的田野实践中对类型的学说充满了兴趣。而对类型的认识是早期社会民族志在产生“代表性”的抽样之外认识整体最重要的知识途径(Desrosières,1998:213)。

这一点在进步主义时代社会调查的早期代表布斯对东伦敦的调查中就可以看出来。²¹布斯将各个街区的劳工阶级分为八个等级,而在其中的每一个类别之下,他又常常分出若干亚类(subgroups)。²²尽管这些亚类

20. 例如,在贝克(Becker,1940)讨论“类型建构”的文章中,所谓 monographic 的方法已经失去了勒普莱笔下那种直接而深入观察的意义,变成了对具体例子进行深入研究而拒绝普遍化命题的意思。

21. 这也是布斯著名的伦敦调查的开始,他在伦敦的田野工作的成果是名为《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工作》(*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of London*)的报告。全部报告分17卷,分别在1889—1903年出版。布斯对东伦敦区的调查在1885年之前的几年就开始了。对这一区域的调查,不仅使布斯修正了社会主义党领袖海德曼(H. M. Hyndman)于1885年“伦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为贫困人口”的说法(布斯认为有35%),也促使布斯用家庭收入和消费来计算贫困线(poverty line)(Wright,2009:68)。在布斯之前,担任通讯员的英国人马修(Henry Matthew)于1849—1851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他在工厂对工人的观察和与工人的对话,后来这些报道集结为《伦敦的劳工与伦敦的穷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于1861年出版。但在马修和布斯之间的30年,模仿前者进行的工作却非常少,缺乏支持的机构可能是其中原因之一(Bulmer,Bales and Sklar,1991:14)。

22. 在这一分类中,第一类是最低的阶层(the lowest class),包括临时工、待业者和不法之徒;第二类是极端贫困者,包括散工和收入仅能果腹者和生活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者;第三类和第四类包括一般的穷人,即因为工作不稳定,或是工作稳定但工资低廉而收入微薄的人;第五类和第六类包括工作稳定并且工资合理的所有工人;第七类和第八类则包括中下和中上的中产阶级以及生活更为优越者(Booth,1903:180)。

之间的界限在他看来是变动的，但每一个类别的劳工体现出一种类别的情感结构，这就是布斯在每一类别的介绍结尾处所提取的共同之处。²³我们注意到，尽管强调对数字材料的搜集分类，甚至他也使用诸如“常规的收入”(regular earning)、“相对而言的舒适度”(comparative comfort)(Booth, 1903: 6)等说法，但布斯极少使用“平均数”(average)来代表任何一种类别或是亚类的劳工在收入、酗酒，以及贫困中的存在。²⁴

在布斯的调查中，众人眼中的贫困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视为一种亟待纠正的社会罪恶，²⁵他显得过于冷静的修辞多少延续了勒普莱对制造者作为正常的劳动者的观察。但在布斯的时代，这种源于道德统计学的改良是站在某种临界点上的：它或者将某一种社会集群(social aggregates)的习惯自然化，事实上支持类型化和分类作为社会的基本形态(Cole, 2000: 12)，或者在发生矛盾的社会集群面前再度找到中间环节去将不同的习惯连接成整体理想的一部分(Rodgers, 1987: 179)。

改良与科学的关系是社会学家重看这段时间深入到城市、工厂、田舍、教堂，以及各种法律不入之地的田野工作的基本视角之一。²⁶混合了社会研究和改良意识的进步主义社会研究从贫困开始扩展至大工业下的劳工问题。在此转向之后，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也将重点

23. 例如，对上述第二类的劳工(布斯编为B)，布斯(Booth, 1903: 43)认为其脾性是“工作和休闲都随心所欲，对之应恰如其分地称为穷人中的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 among the poor)。

24. 在对东伦敦的调查中，布斯(Booth, 1903: 135—139)只是在第五章将平均数用作测量贫穷的指标，假设成年女性食物摄入量是成年男性的四分之三，而儿童食物摄入量是成年人的四分之一，他因此将家庭的食物消耗用相当于几名成年男子摄入量来进行平均。

25. 尽管“社会罪恶”(social evil)这个概念仍然被使用，但布斯(Booth, 1903: 25—26)并没有进一步在调查中将这个说法道德化。

26. 比较典型的概括是“凡令社会改良的科学受益的，即不利于社会学”(Abrams, 1968: 52)，这种改良和科学的更替仍然是看待早期社会研究的基本主要点。很有意思的是，持有这类评价的学者恰恰又不否认和进步主义社会研究并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和道德想象。工业小说用比社会研究还要细致的民族志手法来呈现的情感结构难道不是社会调查运动内在的对规范的认识吗？如果承认这一点，即使我们将上文瓦尔德所说的自由式的实证主义视为整个进步主义时代的动力学，那么问题就变成，为什么只有在英国形成了我们在社会调查运动中看见的那种“经验—道德”想象力？在涂尔干代表的法国道德科学和“社会政治协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代表的历史主义的国民经济学那里，这种类似的冲动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早期社会研究的类型(Sheehan, 1966: 67—95; Rueschemeyer and Van Rossem, 1996)。

转向了导致贫困的机制,工资、工会和工人的族群问题开始越来越受到工业民族志作者的重视。²⁷ 针对劳工问题的新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推进了此前对贫穷的调查工作,也启发了社会研究此后对工业社会中人的自然的思考。²⁸ 在 20 世纪的前十年,这种承前启后的劳工问题亦成为不同的社会研究交流的重要议题。²⁹

当社会学“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哈布瓦赫运用家庭预算来调查法国工人家庭的生计和工人意识的时候,大西洋对面的美国宾州也开始了类似的工人调查。1908 年,拜茵顿(Margaret F. Byington)前往阿勒格尼县(Allegheny County)的侯姆斯泰德区(Homestead borough)进行田野工作。同样是从工人家庭的账簿着手,拜茵顿对这个著名的钢铁工业区的 90 户工人家庭进行了深入访谈并了解了这些家庭从 1907 年 10 月 1 日到 1908 年 4 月 1 日的支出状况。³⁰ 与被访者对家庭财务的估计相比,拜茵顿更为看重可以获得的家庭财务的记录。她的民族志再现了钢铁工人家庭“经济生活”的情境:一个家庭每周的支出,以及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家庭主妇如何决定哪些是必需品,哪些需要优先购买(Byington, 1910: 44—45、60、82、84);在不同的收入等级内,一个家庭每周平均花多少钱在食物上面,花多

27. 奥康纳(O'Connor, 2001: 33)将这一进步主义时代的变化视为“贫困知识”(poverty knowledge)的第一次重要变化。

28. 需要指出的是,改良与科学的关系实质上是社会科学对规范性(normativity)的探求和认识的问题,因此不是学科前史的问题(Haskell, 1977: 250—251),而是我们对社会科学为什么认同某些规范(例如,客观性)(Novik, 1991),以及为什么某些理念在社会科学的某个阶段会取得规范共识(Herbst, 1965; Ross, 1985)。即使在社会学民族志的发展来说,在本文不会涉及的 20 世纪 20 年代以及研究型大学大幅扩张的战后,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工程学非但没有消失,而且还以更为复杂的形式与学科和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Platt, 1996: 155—191; Berman, 2012)。

29. 例如,在布斯之后对英格兰的贫困调查有重要推进的罗恩特里(Seeborn Rowntree)就和哈布瓦赫有过联系,哈布瓦赫 1907 年在法国进行的工人家庭的调查的确也借鉴了英国贫困调查的方法(Desrosières, 1998: 223)。

30. 90 户在进步主义时代的民间调查来说已经并不算小。同一时间英国的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组织的全国和跨国调查已经如火如荼,虽然完全没有采用抽样的办法,但这种调查涵盖的工人家庭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这一调查意在对比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因此在法国就有 5 606 户家庭被访(Desrosières, 1998: 223)。更重要的是,这一出发点也为国家比较的调查确立了比较一国之内不同的工业城镇的框架,而工业城镇恰恰是下文要涉及的匹兹堡调查中一系列田野工作的基本考察单位。

少钱在房租上面；³¹在家庭收入增加的时候，用于食物的支出是怎么变化的(Byington, 1910: 67)。

很有意思的是，在进行田野工作的时候，拜茵顿就已经知道了在炼钢区进行了普查(mill census)，也就是说，她确实知道自己民族志描写的这 90 户家庭的家计生活在代表性上的偏误。这个偏误的确也被匹兹堡调查计划的主持人克罗格(Paul Kellogg)在前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但拜茵顿的理解是，如果这 90 户家庭在族群、智力水平和收入等条件上相当于普查的一个合格样本，那么自己的田野工作也可以说是普查的一个微缩(miniature)。

问题是，如果只是在田野观察和描述中表达这个理想，她本来就有更为便捷的普查性材料可以使用，³²但拜茵顿没有这样做。在她看来，如果这些家庭包含了家计生活的重要元素，那么对其进行细致的田野观察和描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类型化工作)同样也能揭示特定的消费样式。拜茵顿在全书中常常使用的“正常类型”(normal type)这个词只是在表面上体现了“凯特勒式”的理想。她的类型化工作的焦点是类别的交互，以及深入描写达到某种收入或支出水平的家庭是如何度日的。在对开支数量进行田野观察之后，拜茵顿对这 90 户家庭按照族群、技术熟练程度(skilledness)和收入档次进行了不完全的交叉分类。³³

31. 很显然，食物花销和家庭的人口构成大有关系，而在这一点上，拜茵顿(Byington, 1910: 69)和 20 多年前的布斯调查时采取的手法是一致的，即假设成年女性和儿童的消耗量相当于成年男性的一定百分比。

32. 即她知道的钢产区的普查(mill census)和她自己在书中引用的美国劳工部的年度报告(U. S Bureau of Labor, 18th annual report)。拜茵顿(Byington, 1910: 73)引用此报告，意在说明一夫一妻和三个 14 岁以下的孩子是一个“正常家庭”的规模。事实上，就在勒普莱的学生谢松为自己的老师所做的辩护中，我们已经发现，monograph 的方法和使用来自行政部门的统计数据或者普查类的资料就有了相互结合的趋势，后者作为集合类的材料，以均值的方式指示出了“总体”，而 monograph 则是在这个范围内以个案为基础进行更为有效的类型化(Desrosières, 1998: 214)。也就是说，社会学民族志的写作需要建立在调查材料的基础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接触调查材料或先做调查再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田野就此成为一种普遍实践的顺序。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运用开放式访谈(open-ended interview)或者小型调查为民族志田野做铺垫仍被一些社会学家视为少数派的做法(Harper, 1992: 149-150)。

33. 在她的眼中，普通的工人就是那些技术不熟练的工人(Byington, 1910: 41)。在交叉之后，她发现，每周收入少于 12 美元的工人主要是斯拉夫裔的日工(Slavic day laborers)，收入低于这一标准的 24 户家庭中有 21 户是斯拉夫裔，其中许多是新来此地的。在收入的高端，也就是每周收入不低于 20 美元的家庭，其中大部分都是本地白人家庭(23 户中有 15 户如此)(Byington, 1910: 40)。

其中,族群和平均消费量(即平均每天的支出是多少美元)的交叉是她对工人建立分类尤为倚重的办法。不过,在开展调查的时候,侯姆斯泰德区正处在经济萧条中,拜茵顿很清楚地意识到,对收入一定的家庭的来说,详细分析这些家庭的支出细节会降低经济萧条对认识一个家庭生计带来的干扰。正是在对家计的详细分析中,拜茵顿(Byington, 1910:192)类型化的问题从被研究的家庭是不是能代表钢铁工人群体的问题,变成了什么是特定收入的工人家庭的典型支出样式(typical expending mode)。³⁴在她民族志的第十章,拜茵顿就利用之前对家计观察所得到的材料描述了家庭平均月收入在1.65美元的家庭是如何在侯姆斯泰德生活的。

进步主义调查部分实现了从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的变化,这一点并不特别引人关注。更为社会学史研究者倾心的是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观察和田野工作如何表达了工业化浪潮下的道德关切。在拜茵顿的田野工作中,基于描写支出模式而建立的工人家庭类型和对劳工生活情境的关注都悉数体现出来,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清楚。拜茵顿在书中的道德关心,一方面是钢铁工人内部的不满和不平衡,特别是针对熟练工人的怨言,另一方面,这一工业民族志仍然倾向于将看到的“工人”问题与公民政治的失败和漏洞关联起来(Byington, 1910: 22、27、29、175)。这多少朴实地呼应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内部,特别是“威斯康星学派”的旧制度经济学派对道德干预的支持。³⁵

这种倾向更为强烈地体现在和拜茵顿一样来到匹兹堡做钢铁工人调查的费齐(John A. Fitch)身上。身为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的学生,有着更强的社会科学背景的费齐在深入阿莱格尼县对钢铁工人

34. 拜茵顿很清楚,因为带领她进入侯姆斯泰德的本地人是斯拉夫裔,所以很多该族裔的人进入她的田野工作(Byington, 1910:134 脚注)。她也同样清楚,典型的消费样式依赖于被调查的家庭是不是保留了足够多的家计账簿,而愿意并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主妇多半是技术熟练工人的妻子(Byington, 1910:194)。

35. 例如,康芒斯(John Commons)及其在这一时期的劳工与社会立法中的积极参与(Moss, 1996)。如果略为长期地考察这种对道德干预的呼吁,我们会看到强调劳资冲突的做法(这是威斯康星学派的主要阵地)和强调保障立法这两种倾向,这两种做法都在美国实现了政策与社会科学的结合(Stryker, 1990)。但从进步主义到新政实施的过程也是前一种做法退出政策界和学界的过程(Stryker, 1989; Bateman, 2001)。

进行调查的时候就已经对进步主义时代的改良运动有了详细的了解。³⁶费齐在有 7 万多位钢铁工人的阿莱格尼共进行了 10 个月的调查,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匹兹堡(8 个月,余下的 2 个月的田野则是在拜茵顿写民族志的侯姆斯泰德)(Fitch,[1910]1989:9)。无论是费齐自己还是 20 世纪晚期关注他的学者,都觉得这一民族志的特别之处在于超越了劳工与劳资关系的框架。费齐自己为这个研究计划所准备的题目在主题的范围方面都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阿莱格尼县的工业民族志,这部分是因为它想在“劳动者”这个框架之外看待工人的人生。³⁷而这种从“工人”(worker)到“工作之人”(working man)的转变,仍然影响着 20 世纪 80 年代来到美国东部工业区的民族志作者。³⁸后世的劳工史学者认为费齐的这个工业民族志并不只是在劳工问题上有贡献,也直指当时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问题。³⁹

但被费齐超越的劳工问题仍占据了这本民族志极大的篇幅。⁴⁰在描述“劳工问题”的时候,和拜茵顿一样,费齐也大量运用了均值来描述

36. 参见匹兹堡调查的主持和发起人克罗格给费齐写的导言(Fitch,[1910]1989:XX)。费齐在威斯康星的导师康芒斯本人也是克罗格主持的匹兹堡调查的建议者。在进入这项调查计划之前,费齐本人在克罗格主持的《调查》(Survey)杂志[前身是纽约慈善组织会社的会刊《慈善》(Charities)]作了将近十年的作者和编辑,在克罗格主持下出版的“匹兹堡调查”共计六部,而收入费齐这本民族志的“匹兹堡社会与劳工史研究系列”还收入了另外两部民族志,即巴特勒(Elizabeth Beardsley Butler)写的《妇女与贸易》(Women and the Trades)和拜茵顿的《侯姆斯泰德:钢城的家庭》(Homestead: The Households of a Mill Town)。

37. 费齐原本的民族志计划叫做“大型工业产出中人的面向:美国六州的钢铁业与钢铁业工人”(The Human Side of Large Output: Steel and Steel Workers in Six American States)。

38. 哈雷(Halle,1984)之所以没有像费齐一样去看待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想解决对蓝领工人到底是不是在经历中产阶级化的问题(xiii-xiv)。

39. 当费齐的著作时隔 80 年被匹兹堡大学再版的时候,身为劳工史专家的序言作者吕博夫(Lubov)认为,费齐的这种对作为人的劳工的关注使得本书对思考劳工和思考民主制度本身都有重要的意义(Fitch,[1910]1989:3)。费齐在本书的开始显示了他对狭义的劳工问题,也就是劳资关系的关注。他简要梳理了这一地区从 1858 年以来的工会发展状况,1876 年匹兹堡的四个工会组织合并为钢铁业工人协会联盟(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the Iron and Steel Workers)和 1892 年侯姆斯泰德的大罢工是工会发展的两个转折点(Fitch,[1910]1989:4-5)。费齐(Fitch,[1910]1989:87-88)认为,1880—1890 年是本地区劳资关系最和谐的十年,大罢工之后的工会逐渐失去了影响力。到他做田野的时候,加入工会的钢铁业工人已不足三分之一。但费齐始终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这十年劳资关系比较和谐。

40. 全书的第十二章是关于工资和生活成本,第十三章是关于工作时长,全书的第二编(共 3 章)关注了劳资关系中劳工的一方,第三编(共 6 章)关注了资本家的行为。

典型的钢铁工人的生活状况,⁴¹但他对使用均值来表述典型类型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谨慎(Fitch,[1910]1989:162)。费齐很明白均值在阿莱格尼的田野观察中会发生干扰的原因之一是熟练工人的分布及不均问题(Fitch,[1910]1989:164)。技术型的、半技术型的和纯粹体力型的工人之间的差别,以及对技术型工人的不满在拜茵顿的民族志中呈现得相当明显。而在费齐(Fitch,[1910]1989:9、154)的田野观察中,六成钢铁工人都属于非技术型工人,这些人按日领取工资。⁴²费齐(Fitch,[1910]1989:157)发现,在剩下的四成工人中,只有掌握技术的半技术型工人才总能在钢铁业找到工作,真正的技术型工人不是如此。换句话说,这些半技术型的工人比技术型的工人和体力工人都更接近于“典型”的钢铁业工人。⁴³

当费齐以细致的记录来描述和他有过长时间交谈的工人(该书第二章的内容)时,他对工人群体的分类迅速超出了技术带来的差异。除了显著的族群差别之外,在他的笔下能代表阿莱格尼钢铁工人的典型类别被称为“干八小时的”(eight-hour man)、“干十二小时的”(twelve-hour man)、“干工会的”(unionman)、“入教的”(churchman),等等(Fitch,[1910]1989:21、98)。在19世纪末和进步主义时代的田野工作中,无论是我们之前论述过的勒普莱、英国的贫困研究者,还是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哈布瓦赫等人,调查者无不是依赖存在于研究对象之间的生活关系来获得基本的材料,从而对农民、工人或穷人的生活类型化。⁴⁴这一点在匹兹堡调查中被延续下来。但费齐注意到,无论是此前的经典社会学民族志,还是他在这一地区的同行,即使是和自己调查同样对象的拜茵顿,都没有在民族志中呈现工人的声音。因此,费齐像人

41. 全书中不乏这样的说法,例如,“平均来看,一个炼钢工人”(the average mill man)、“平均来看的,一个说英语的炼钢工人的家有四个房间,通常房间里面没有下水道”(the average English-speaking mill worker's home contains about four rooms and not infrequently is without plumbing)(Fitch,[1910]1989:37、151)。

42. 非技术型的工人占到如此高的比例,在费齐看来是因为大型的钢铁公司雇用了来自欧洲裔的移民工人,这些人多数都无法成为技术型的工人,这导致工种之间的差别和族群之间的差别密不可分(Fitch,[1910]1989:4)。

43. 费齐(Fitch,[1910]1989:20)承认,和他交谈的技术型工人的确带着一种很少见的气质:“我访谈一百多人里面,有这样气质的人不超过三个”。

44. 对勒普莱来说,就是家父长(贵族)对家庭的选择;对布斯来说,就是利用家访者的数据而对哈布瓦赫来说,就是工会。在这种类型化思维中,代表性和总体的观念并没有出现。

类学家或传记学家那样，把和他进行了长时间交谈的工人（他眼中的典型的工人）的生平，这些人在他目力所见的生活状况，以及这些工人言谈中表达的意见汇集起来（Fitch, [1910]1989:11 页以下）。

1912年出版的《匹兹堡经济调查》（*The Report of the Economic Survey of Pittsburgh*）同为匹兹堡调查计划的一部分，作者霍尔德索斯（J. T. Holdsworth）在进入田野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所谓的社会调查已经成为从政府到社会组织都在进行的事业了。但作者更加明白，自己进入匹兹堡的目的是寻找一个“好城市”（good city）的方案和一个使匹兹堡成为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美国城市的方案（Holdsworth, 1912: 6）。和拜茵顿一样，霍尔德索斯在类型化的工作中同样以美国劳工部的年度报告作为构造“典型的工人家庭”的起点，⁴⁵但这种类型化的焦点并非工人家庭的支出，而是其工作和无事可做（idleness）的时间比率。类似这样用均值来表达“典型”的用法在整个田野工作的报告中是非常少见的。更多的时候，类型化的做法在霍氏的田野观察中是以影像的方式呈现的，我们找不到如拜茵顿处理家计那样的描述过程。⁴⁶在霍氏的民族志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数字（plain numbers），但几乎没有一处像拜茵顿和费齐的民族志那样将其聚集在特定的关注点上。

在民族志背后的道德意识方面，霍尔德索斯和布斯一样，都将城市生活（伦敦和匹兹堡）视为其田野工作的最终归宿，但各自的田野手法差别很大，如上文所说，布斯将贫困人口分为八种类别的做法同时也是将城市空间进行分隔的办法。将由此得到的伦敦各区的贫困率进行对比，一方面会发现各种类别的贫困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别，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各区在贫困人口比率上的彼此差别，以及和城市总体的差别。但霍氏的手法不是对人群分类和空间分区的交互，而是将田野观察中的经济问题放回城市这个总体情境，然后讨论每一个经济问题“对城市影响的好与坏”。匹兹堡作为整体，在霍尔德索斯那里不是与每一个空间分区

45. 这一报告指出，“在全美 24 402 户典型工人家庭的户主中，49.8%的人至少有一周是无事可干的”（Holdsworth, 1912:138）。

46. 例如，在描述特定房租支出的范围内（比如，13—15 美元为一类，20 美元以上为另外一类）什么样的房子是典型的时候，霍尔斯特德特直接将典型租房的照片放在民族志中并附以简短的说明，这一章共展示了 89 张这样的图片，但我们并不知道为何图示的房屋就是这一租金段的典型。

进行比较(布斯的方法),而是和其他在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形成竞争的城市比较。⁴⁷例如,不同城市对同一工作的工资,以及同种工作所挣的1美元在不同城市的购买力的对比(Holdsorth,1912:8—13)。⁴⁸在这本民族志的每一个章节中,霍尔德索斯都呈现了匹兹堡之外的其他城市的进展。他笔下的匹兹堡和充满批判色彩的民族志因而有了很显著的区别。在他看来,良好的城市所需要的恰是公民协作意义上的整合和一种令生活和商业并行不悖的社会建设的原理(Holdsorth,1912:27—28)。

有趣的是,霍尔斯特德笔下坚持的这种基于城市比较的“发展观”也正是布斯在英格兰的后辈们在继续针对贫困的田野工作中所追求的。在19世纪末的欧洲、美国发生的“举国”特性的政治、市场和民情变化之前,地方性的建构是社会学田野最重要的想象力来源(Henlock,1976,1987)。在布斯之后,罗恩特里(Seebom Rowntree)在英格兰其他城市(York)针对贫困人口田野工作产生的重要质疑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很难用劳工的行为特征来解释。一个在城市之上的国家反贫困工作呼之欲出。在连续针对城市贫困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出现之后,1908年,英国通过了新济贫法(new Poor Law),这可以算是反贫困从市政层面上升到国策层面的突出反映。布斯的伦敦调查留给早期社会学民族志的另一个见解是在贫困人口类型和城市空间分区之间建立交互。虽然在他之后的英格兰调查运动中进一步被边缘化,但这一田野工作的见解慢慢演变成对城市内不同空间的敏感。⁴⁹也就是说,你生在何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成为此后以芝加哥为基地的城市民族志的基本理念之一。

四、结语

本文一开篇就指出,发生在社会学民族志之中的两个尚未结束的

47. 在各种实质性的指标(例如,猪肉价格)中,与之相比较的城市就以100为基础相应计算各自的指数,作者以此来看出匹兹堡在同类城市中的位置(比100差多少)。

48. 这一民族志只有在比较食物消费的时候才有了城内的概念,作者比较了三种不同的商店(高等商店、连锁店和典型工人消费的商店),认为城内地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差异重要(Holdsorth,1912:74)。这和拜茵顿对类似恩格尔系数的关注完全不同。

49. 布斯将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在东伦敦的聚落以制图的办法标识出来,在20世纪初的英美城市的民族志中,这一做法被用来标注城市不同族裔人口的聚落(Bulmer, Bales and Sklar, 1991:12—13)。

变化使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一，社会科学和传统的人文学研究在田野中开始融合，使得社会学田野工作一直致力于探索的生平处境对人文类型的知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二，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又再度在叙述——无论是讲故事还是讲道理——的复兴之中并行和融合，这反过来使得社会学民族志的研究者对生平处境——无论是时间结构充盈的生命史还是仪式感层叠的互动结构——的理解更为丰富。

然而，这两种重要的变化促成了社会学田野工作与其他社会研究方式的结合，却没有根本解决社会学民族志最长久的张力之一：田野工作的对象既是最具体的发生，也是最深刻的理论构成。换言之，民族志的困难在于如何让田野对象的生身处境不只是证明理论的主张和概念的思辨，而是去触发最深刻的理论想象力。

因此，社会学民族志写作在捕捉田野对象的个性和寻找理论创造力上都面临挑战。面对这个挑战，过去数十年来，社会学民族志的学者在扩展民族志的时空结构上寻找了一些解决的做法，但本文并没有着力梳理这一线索。在戈夫曼的“田野与互动框架”和威廉斯的“感受力的结构”的启发下，本文重新进入社会学民族志较早、也较为我们少知的奠基时期，即从 19 世纪后期到一战之前的时期。本文在这一时期所选取的早期社会研究多少在学科史上都已有定论。推动这些定论的基本视角认为，社会调查向更为严格的抽样调查与社区研究的发展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从充满烟火气的改良道德中自我纯洁的必经之路。

本文重返这些不那么典型的社会学民族志却发现，从农庄（勒普莱）、城市（布斯）到钢厂（匹兹堡工业民族志），早期的社会研究都在寻找类型化的实践中改变了“直接观察”的田野经验（从家庭账簿表到贫困人口类别与空间分区的交互，再到工人类别与族群的交互等），与此同时，早期的民族志写作者也深刻调动了在田野观察背后的情感结构，使得社会学民族志的规范想象力在看似边缘和压抑的社会空间和反常的风俗之上生成了对集体道德（也就是社会本身）的强烈意识（家父式的传统、贫困的空间属性和劳工问题的人性论）。

社会理论史的作品常常用进步主义和道德统计学等来捕捉这种迸发于最具体经验中的道德图示，但本文对这些理论史作品的简略梳理

表明,即使我们承认进步主义的社会和道德脉络下有所谓自由实证论的倾向,英美的早期社会研究与法国、德国在实现方式上仍有重要区别。这些差别也在被总称为“进步主义”的道德想象力中留下重要的区分:英美通过社会工程学的道德努力进入最细致的田野实践,体现为民族志把握城市和工业生活最微观变化的描摹,但这些努力需要进一步和诸如道德统计学这样的同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田野工作做细致的区分。这样的努力将为我们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比较,或者是再次进入一战之后的社会学历史准备足够重要的问题。本文至少表明,将田野经验通过情感结构而触发新的道德想象力的过程用简单的学科演进或范式转移来看待,并不足以让我们理解本文开始提出的社会学民族志的内在紧张。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社会学民族志的类型化工作在改变社会学的经验感和理论意识中有持久贡献。

社会学的道德想象力总是需要经验透过情感的结构来触发,因此,这种民族志尤其需要在单纯地讲故事(描述或是情境的重建)或讲道理(解释或者是道德阐述)之外具备新的叙述手段。从早期的社会研究开始,在每一个所谓的社会学学派的背后,靠的都不只是关切田野对象的道德同情心,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作者、被研究者和同行(同事)三者之间的同情、同理之心。社会学的民族志需要在作者和他的对象之间,以及不同的田野工作者之间形成同情、同理之心,这是现代学术独特的结构,也因此包容了我们自己的情感与价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陈涛. 2017. 涂尔干的道德统计学:源流、发展及困境[J]. 江海学刊(2):99-109.
- 李章鹏. 2008. 社会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G]//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 黄兴涛,编.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42-91.
- 吕文浩. 2008. 重审民国社会学史上的社会调查派[G]//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 黄兴涛,编.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92-131.
- 马长寿. 2009.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序言[G]//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3-210.
- 齐钊. 2013. 社区·区域·历史:理解中国的三种进路——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传统与研究特色的再分析[J]. 开放时代(6):107-120.
- 渠敬东. 2019. 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J]. 社会 39(1):1-36.
- 田耕. 2017. “社会调查”的内与外:思考早期社会研究的两种思路[J]. 学海(5):87-94.
- 项飏. 2012. 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与印度的技术劳工[M]. 王迪,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温春来、黄国信,主编. 2017. 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的理论、方法与案例[M]. 南宁:广西师

- 范大学出版社。
- 杨堃. 1991. 评李景汉著《实地调查方法》[G]//杨堃民族研究文集. 北京:民族出版社:29-38.
- 杨清媚. 2010. 知识分子心史——从 ethnos 看费孝通的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J]. 社会学研究(4):20-49.
- 叶启政. 2018. 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M]. 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 Abbott, Andrew. 2001. "What Do Cases Do?" In *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9-160.
- Abbott, Andrew. 2007. "Against Narrative: A Preface to Lyric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25(1): 67-98.
- Abbott, Andrew. 2017. "Living One's Own Theory: Moral Consistency in the Life of émile Durkheim." Manuscript.
- Abrams, Philip. 1968. *The Origins of British Sociology, 1834 - 1914: An Essay With Selected Pap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rmenteros, Carolina. 2007. "From Human Nature to Normal Humanity: Joseph de Maistre, Rousseau, and the Origins of Moral Statistic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8(1): 107-130.
- Bateman, Bradley W. 2001. "Make a Righteous Number: Social Surveys, the Men and Religion Forward Movement, and Quantification in American Econom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3): 57-85.
- Bearman, Peter. 2005. *Doorm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ker, Howard. 1940. "Constructive Typ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0-55.
- Berman, Elizabeth. 2012. *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 How Academic Science Became an Economic Engi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lumer, Herbert. 1954. "What is Wrong with Social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1): 3-10.
- Booth, Charles. 1903.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 Brubaker, Rogers and Frederick Cooper. 2000.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29): 1-47.
- Brubaker, Rogers, Margit Feischmidt, Jon Fox, and Liana Grancea. 2008. *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Everyday Ethnicity in a Transylvanian Tow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ulmer, Martin,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1991.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 - 1940*, edited by Bales Bulmer and Skl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98.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16(1): 4-33.
- Burawoy, Michael. 2009.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Four Countries, Four Decades, Four Great Transformations and One Theoretical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yington, Margaret F. 1910. *Homestead: The Households of a Mill Town*. New York: Charities Publication Committee.
- Cole, Joshua. 2000. *The Power of Large Numbers: Population, Politics, and Gender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i, Stefan, Donald Winch, and J. W. Burrow. 1983. *That Noble Science of Politics: A*

-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Intellectu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nverse, Jean M. 1987.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Roots and Emergence, 1890 — 19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anbom, David B. 1987. “*The World of Hope*”: *Progressives and the Struggle for an Ethical Public Lif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Daston, Lorraine. 1987. “Rational Individuals versus Laws of Society: From Probability to Statistics.” In *The Probabilistic Revolution*, edited by Lorenz Krüger, Lorraine J. Daston and Michael Heidelberger. Cambridge: MIT Press.
- Deleuze, Gilles. 1979. “Preface.” In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by Jacques Donzelo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Desmond, M. 2007. *On the Firel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srosières, Alain. 1998. *The Politics of Large Numbers: A History of Statistical Reason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onzelot, Jacques. 1988. “Promoting the Social.” *Economy and Society* 17(3): 394 — 427.
- Drolet, Michael. 2003. *Tocqueville, Democracy, and Social Refor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Duneier, Mitchell. 2002. “What Kind of Combat Sport is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6): 1551 — 1576.
- Duneier, Mitchell. 2011. “How Not to Lie with Ethnography.”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41(1): 1 — 11.
- Fitch, John. [1910]1989. *The Steel Worker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Flanagan, Maureen A. 2007. *America Reformed: Progressives and Progressivisms, 1890s — 192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91. “Governmentality.”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ited by G. Burchell, C. Gordon and P.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iendly, Michael. 2007. “A. -M. Guerry’s ‘Moral Statistics of France’: Challenges for Multivariable Spatial Analysis.” *Statistical Science* 22(3): 368 — 399.
- Glaser, Barney G. and Anselm L. Strauss.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Goffman, Erving. 1989. “On Field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8(2): 123 — 132.
- Goldman, Lawrence. 2002. *Science, Refor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The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1857 — 18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thorpe, John. 2000. “Sociological Ethnography.” In *On Sociology: Numbers, Narrativ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The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5 — 93.
- Gusfield, Joseph R. 1963. *Symbolic Crusade, Status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Temperance Movemen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Hacking, Ian. 1987. “The Prussian Numbers.” In *The Probabilistic Revolution*, edited by Lorenz Krüger, Lorraine J. Daston and Michael Heidelberger. Cambridge: MIT Press: 377 — 394.
- Hannerz, Ulf. 2003. “Being There... and There... and There !” *Ethnography* 4(2): 201 — 206.

- Halle, David. 1984. *America's Working Man: Work, Home and Politics among Blue-Collar Property Own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per, Douglas. 1992. "Small N's and Community Case Studies." In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ies*, edited by Charles Ragin and Howard Beck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9–158.
- Haskell, Thomas L. 1977. *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ce: 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risis of Authori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Hennock, E. P. 1976. "Poverty and Social Theory in Engl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Eighteen-Eighties." *Social History* 1(1): 67–91.
- Hennock, E. P. 1987. "The Measurement of Urban Poverty: From the Metropolis to the Nation, 1880–192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0(2): 208–227.
- Herbst, Jurgen. 1965.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Cul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oldsworth, John Thos. 1912. Report of the Economic Survey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
- Horne, Janet R. 2001. *A Social Laboratory for Modern France: The Musée Social & the Rise of the Welfare Stat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ughes, Everett. 2002. "The Place of Field Work in Social Sci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Darin Weinberg.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139–147.
- Knorr-Cetina, Karin. 2014. "Intuitionist Theorizing." In *Theorizing in Social Science: The Context of Discove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9–60.
- Lacey, Michael. 1993. "The World of the Bureaus: Government and the Positivist Project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State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Michael Lacey and Mary Furner. Washington D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7–170.
- Lasch-Quinn, Elisabeth. 1993. *Black Neighbors: Race and the Limits of Reform in the American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 1890–194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Liebersohn, Harry. 2003. "Scientific Ethnography and Travel, 1750–185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VII: Modern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0–113.
- Lindenfeld, David F. 1997. *The Practical Imagination: The German Sciences of Sta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ss, David A. 1996. *Socializing Security: Progressive-era Economist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Poli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ovik, Peter. 1991.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Connor, Alice. 2001. *Poverty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Social Policy, and the Poor in Twentieth-Century U. S.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acewicz, Josh. 2016. *Partisans and Partners: The Politics of the Post-Keynesian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itt, Alan. 1988. "Frédéric Le Play and the Family: Paternalism and Freedom in the French Debates of the 1870s." *French History* 12(1): 67–89.
- Platt, Jennifer. 1996.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America: 1920–19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rter, Theodore. 1987. "Lawless Society: Social Science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 Statistics in Germany, 1850 — 1880.” In *The Probabilistic Revolution*, edited by Lorenz Krüger, Lorraine J. Daston and Michael Heidelberger. Cambridge: MIT Press; 351—376.
- Porter, Theodore. 2011. “Reforming Vision: The Engineer Le Play Learns to Observe Society Sagely.” In *Histories of Scientific Observation*, edited by Lorraine Daston and Elizabeth Lunbec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81—302.
- Rodgers, Daniel T. 1987. *Contested Truths: 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dgers, Daniel T. 1998.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ss, Dorothy. 1990.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eschemeyer, Dietrich and Ronan Van Rossem. 1996. “The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and the Fabian Society: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Policy-Relevant Knowledge.” In *States, Social Knowledg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ocial Policies*, edited by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heper-Hughes, Nancy. 2001. *Saints, Scholars, and Schizophrenics: Mental Illness in Rural Ire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hweber, Libby. 2006. *Disciplining Statistics: Demography and Vital Statistics in France and England, 1830—1885*.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99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art IV.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well, William H. 1992. “Introduction: Narratives and Social Identitie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6(3): 479—488.
- Sheehan, James. 1966. *The Career of Lujo Brentano: A Study of Liberalism and Social Reform in Imperial Germa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ilver, Catherine. 1982. “Introduction.” In *Frédéric Le Play on Family, Work and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Catherine Silv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34.
- Steinmetz, George. 1992.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Social Narratives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arrative Theor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6(3): 489—516.
- Stigler, Stephen M. 1999. *Statistics on the Table: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al Concepts and Metho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tone, Lawrence. 1979.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85(1): 3—24.
- Stone, Judith F. 1985. *The Search for Social Peace: Reform Legislation in France, 1890—1914*. SUNY series in modern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trauss, Anselm L. and Juliet A. Corbin. 1994.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Sage.
- Stryker, Robin. 1989. “Limits on Technocratization of the Law: The Elimination of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s Division of Economic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3): 341—358.
- Stryker, Robin. 1990. “Science, Class and the Welfare State: A Class-Centered Functional Accou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3): 684—726.
- Thatcher, David. 2006. “The Normative Cas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6): 1631—1676.
- Van Maanen, John.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aughan, Diane. 2009. "Analytical Ethnograph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Peter Hedström and Peter Bear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88—711.
- Wakefield, Andre. 2009. *The Disordered Police State: German Cameralism as Science and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lton, John. 1992. "Making a Theoretical Case." In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ies*, edited by Charles Ragin and Howard Beck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1—138.
- Wieviorka, Michel. 1992. "Case Studies: History or Sociology?" In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ies*, edited by Charles Ragin and Howard Beck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9—172.
- Williams, Raymond. 1960.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Anchor Book.
- Wright, James. 2009.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Sociology: Francis Galton, Adolphe Quetelet, and Charles Booth; Or What Do People You Probably Never Heard of Have to Do with the Foundations of Sociolog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 3(2): 63—72.

责任编辑：张 军